

遊走於利益之網

● 袁 賀

現代社會給我們的承諾是它為個人提供了多元選擇和最廣闊的舞台；然而，多數人並沒有獲致生活與心靈的安定。加繆曾提醒人們，要像西西弗斯那樣接受某種生存狀態，並稱「焦慮是人的常態」，揭示出現代性承諾的背謬性。這是正常的生活嗎？現代社會是給我們提供了更多的選擇，還是其實沒有選擇？



赫希曼 (Albert O. Hirschman) 著，李新華、朱進東譯：《欲望與利益——資本主義走向勝利前的政治爭論》(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03)。

現代社會給我們的承諾是它為個人的多元選擇提供了最廣闊的舞台，然而，多數人並沒有獲致生活的安定，更不必說心靈的寧靜，這是一個令人困惑的事件。當加繆 (Albert Camus) 提醒人們要像西西弗斯一樣接受一種生存狀態，並稱

「焦慮是人的常態」之時，現代性承諾的背謬性就成為一個需要我們嚴肅對待的問題：這是正常的生活嗎？現代社會是給我們提供了更多的選擇，還是其實沒有選擇？

這個問題顯然引起了許多偉大的思想者的思考，赫希曼 (Albert O. Hirschman) 是其中的佼佼者。阿馬特亞·森 (Amartya Sen) 稱他「是當代偉大的知識份子之一。其著作改變了人們對經濟發展、社會形勢、人類行為以及對確定性、忠誠性和承諾的性質與意義的理解」(見森為該書寫的序言)。《欲望和利益》(*The Passions and the Interests: Political Arguments for Capitalism before Its Triumph*，以下出自本書正文的引文，只標明該書中譯本的頁碼) 這本著作證明了赫希曼是配得上這一評價的，他自己也特別看重該書，「在我所寫的書中，《欲望與利益》始終佔有特殊的地位。」因為它和赫希曼其他的作品是為了證明他人的觀點已經或將是錯的不同，《欲望與利益》是他自己決定徹底研究「關於經濟學與政治學之間的聯繫」的主要論題，「我從未想到要修正這一研究」(二十周

年紀念版自序)。它「既關注當代的經濟理論，也關注歷史上的經濟理論」(見森寫的序言)。和當代那些只將精力集中於經濟增長的理論不同，赫希曼力圖證明一個看來淺顯，卻極具啟發性的看法：「雖然新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源於舊思想，但人們通常低估了這一點。」(導論)這就和本文開始提出的問題密切相關，反思現代性的背謬或許正要從我們通常低估的方向開出一片新天地。

一 教化、壓制、馴化和利用欲望

當今世界兩極政治和經濟結構崩潰以後，資本主義的自由世界似乎應該安枕無憂了，然而事實並沒有給出這樣一個值得歡慶的場景，生活反倒顯得更加不可捉摸，可這並沒動搖人們追求利益——通常是非常狹義的物質上——的信念。赫希曼好像對此早有先見之明，他研究的出發點恰是發現「無論經濟增長是發生在資本主義社會、社會主義社會還是二者兼具的社會，當代社會科學都無法解釋經濟增長所帶來的政治後果，也許更重要的是，都無法解釋經濟增長所帶來的極其頻繁的、災難性的政治後果」(導論)。這種狀況是不是過度重視物質利益而帶來的不可避免的副產品呢？赫希曼正是從考察利益觀念演化的角度進入其研究的。談到利益，一個和它相關的詞彙「欲望」就

同時進入了他的視野。赫希曼注意到孟德斯鳩(Charles Montesquieu)曾經認為欲望可能促使人們做壞人，但是其利益卻阻止他們這樣做。可在現代話語中，人們討論利益的時候，對「欲望」的關注卻很少，然而簡單的事實是人有欲望才去追求利益的。這種遺忘是怎麼發生的？赫希曼的研究從中發掘出了精彩的內容。

在古典與現代的分期中，西方學者的共識大都定位於十六世紀前後，那是現代社會秩序大致形成的標誌，探討其起源則要從中世紀開始。赫希曼發現，在基督教佔據主導地位的中世紀，思想者特別注重對欲望的探討，而且賦予欲望以破壞性的負面含義。奧古斯丁(St. Augustine)的思想最能反映這點，他認為：對金錢和財富的貪婪是令人墮落的主要罪惡中的一種；對權力的貪婪和性的渴望是其他兩種罪惡(頁3)。在當時，歐洲處於一個高度分裂期，基督教會擁有極高的權威，這種思考方式很自然地導致一種通過道德教化來禁欲的思想。然而這並沒有取得預期的效果，一個注重利益的新秩序正在形成，在十七世紀以後，「事實上，不到一個世紀，攫取欲和與之相關的活動，例如，商業、銀行業，最後是工業，由於種種原因得到了普遍的認可。」(頁5)這裏我們不必詳細描述這一過程，一個明顯的事實是這個秩序顛覆了基督教的權威。

這個新秩序就是現代的商業社會的秩序，按施密特(Carl Schmitt)

赫希曼發現，在基督教佔據主導地位的中世紀，思想者特別注重對欲望的探討，而且賦予欲望以破壞性的負面含義。當時歐洲的基督教會擁有極高權威，這種思考方式很自然地導致一種通過道德教化來禁欲的思想。然而這並沒有取得預期的效果，一個注重利益的新秩序正在形成，在十七世紀以後，「攫取欲和與之相關的活動，例如，商業、銀行業，最後是工業，由於種種原因得到了普遍的認可。」

培根依靠他的實驗主義傾向提出了革命性的思想。到十八世紀之時，他已取代亞里士多德成為新知識階層的精神導師，很自然地，「人們期望通過巧妙地利用一種欲望抵制另一種欲望來調控社會發展，這種思想變成了十八世紀相當普遍的智力消遣。」這一思想很快由法國、英國傳到了美國，進而制衡的思想演變成可以操作的原則，使得思想更有現實的說服力。

的說法，「從社會學的角度看，在一個商業活動繁多的時代，決斷的確定性具有特殊的價值，因為在無數情況下，商業更加關注計算的確定性，而較少關注具體的內容。」（施密特著，劉宗坤等譯：《政治的概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頁26）因此，毫不奇怪，科學技術會成為新秩序的寵兒，它對歐洲人思維觀念的革命性變遷起了重要的作用。在這種背景下，人們開始重新認識自己，也重新認識欲望。「正如由於發現落體和行星的規律一樣，數學和天文學技術的發展，使得發現人的行為動機的規律成為可能。」（頁7）和商人的流動性身份相適配，思想者順應潮流，開始虛構出「作為真實自我的個人」。「那『作為真實自我的』人，是當今所謂政治科學的嚴格意義上的主題。」（頁8）這一主題的深度內涵是，個體是獨立而理性的，因而也是平等、自由的，這樣人類就可以期待依靠理性在人間建立天堂！

第一個系統地論述這一政治學主題的是霍布斯(Thomas Hobbes)，由此，人們開始試圖尋找新的方式去對待人的欲望。「有一種看法，產生於文藝復興時期，在十七世紀期間變得根深柢固，即人們不再相信能夠用道德教化式的哲學和宗教戒律來約束人類的破壞欲。必須尋找約束人類欲望的新方法。」「最明顯的一種替代觀點，是對欲望的壓制和約束。」（頁10）由誰來執行這一任務呢？由於人傾向於成為「真實的自我」，因此，國家似乎成為

唯一可能的執行者。這是一個危險的開口，誰來約束國家的代理人呢？「有一種更符合十七世紀心理學的發現和預見。這種解決方式並非是簡單的約束欲望，它包含於馴化、利用欲望的思想中。」（頁11）換言之，國家應該成為一種教化的工具，言下之意是要求統治者本身必須具備相應的道德責任感。實際上，霍布斯已經表達了這個思想。但這仍然很難說是可靠的，因為國家本身是「利維坦」，政治有太大的剩餘價值，一種道德的軟性要求很難保證統治者的自覺。曼德維爾(Bernard Mandeville)揭示的正是這一困難，斯密(Adam Smith)不願意那麼消極的看待欲望，「他用諸如『好處』或『利益』之類的溫和術語代替『欲望』或『罪惡』，從而鈍化了曼德維爾那令人震驚的刀口。」（頁13）

二 制衡欲望：利益的話語霸權之確立

利益開始取代欲望浮出水面！雖然斯密對欲望的看法是更全面的，但還是沒能解決人們擔心的問題。培根(Francis Bacon)不是一個真正的科學家，但毫無疑問，科學的可證偽性原則最早體現在他的思想中，一個科學的理論是需要實驗來證實的。對如何克服欲望的負面影響，培根依靠他的實驗主義傾向提出了革命性的思想，「我思考的是，該如何使一種欲望反對另一種

欲望，如何使它們互相牽制，……就像國家之間有時需要相互制約一樣，一個國家內部也需要相互制約。」(James Spedding et al., eds., *The Works of Francis Bacon*, vol. 3 [London: Longman and Co., 1859], 418) 以欲望制衡欲望的思想就這樣從道德領域延伸到了政治管理領域，這是很契合新秩序需要的一種理論。

到十八世紀之時，培根已經取代亞里士多德成為新知識階層的精神導師，很自然地，「人們期望通過巧妙地利用一種欲望抵制另一種欲望來調控社會發展，這種思想變成了十八世紀相當普遍的智力消遣。」(頁22) 這一思想很快由法國、英國傳到了美國，進而制衡的思想演變成可以操作的原則，使得思想更有現實的說服力。

這一神奇的轉變得益於窄化利益含義，並把它作為馴服欲望的工具。如果說一個詞語含義的變化可以導致一個社會結構的變化，這顯然誇大了語言的作用，或者說是倒果為因了。真實的情況是，這一變遷反映了「作為真實自我的人」在新秩序下越來越注重個人的經濟利益所產生的結果。「經濟發展一旦開始令越來越多的人增加財富成為可能，利益一詞的含義狹義化就無須其他解釋了。」(頁34) 利益何以獲得這種地位呢？這是因為它與傳統的欲望和理性的二元對立的背景不同，它跳出了人性的範疇，顯示出一種中立色彩，「實際上，利益這一概念被看成兼具欲望與理性這兩個範疇各自優良的秉性。」(頁37)

這樣就賦予了利益一種類似於科學的色彩，因為「利益不會撒謊」，這意味着利益是可以預見的，「最基本形式的可預見性是持久性，就是這一品行，也許曾是人們歡迎一個由利益支配的世界的最重要之理由。」(頁47) 顯然，思想家都意識到了市民階層積累財富的欲望的持久性，他們所做的只是為這一狀況提供一個合乎邏輯的說明而已。利益確立了它的话语霸權地位。

三 利益成為美德及其後果

如果利益真的只被理解為愛財，那麼遲早它會喪失對人所具有的控制性魅力，因為人雖然離不開物質，但人決不是物，人還有更多的追求，如果能賦予「愛財」這種頑固的欲望以一種無害性，更進一步，讓它具有美德色彩，那麼困難就會迎刃而解。

知識階層替資產階級(從詞源意義上看，市民、商人和它同義)完成了這個論證任務。從歷史的角度看，資產階級也是從邊緣階層興起的，「這些商業資本家大多出身於社會渣滓。」(皮朗[Henri Pirenne]著，樂文譯：《中世紀歐洲經濟社會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頁9) 把商人看成是鄙吝、墮落的代表是習見，不過，這種地位或許為資產階級洗白自己有利。「在某種意義上，像現在許多暴君的勝利一樣，資本主義的勝利在很大

如果利益真的只被理解為愛財，那麼遲早它會喪失對人所具有的控制性魅力，如果能讓「愛財」這種頑固的欲望具有美德色彩，那麼困難就會迎刃而解。知識階層替資產階級完成了這個論證任務。孟德斯鳩為商業的辯護很有代表性，「哪裏有善良的風俗，哪裏就有商業。哪裏有商業，哪裏就有善良的風俗。這幾乎是一條普遍的規律。」也即是把商業和美德簡潔地聯繫了起來。

當今的政治理論界，對於各種主義與問題的爭辯令人目眩，然而實際上，這只是各種利益群體對商業秩序政治的維護或修補而已。所以赫希曼說：「人們能夠祈求於歷史的，尤其是思想史的，很可能是：不是消除爭議，而是提高爭論的水平。」這絕對是思想史家的睿智之處，也表明思想史研決非純理論或哲學研究、也不是經驗研究所能取代的。

程度要歸功於人們普遍地拒絕相信它能一展宏圖或取得重大成就。」(頁54) 孟德斯鳩為商業的辯護很有代表性，「哪裏有善良的風俗，哪裏就有商業。哪裏有商業，哪裏就有善良的風俗。這幾乎是一條普遍的規律。」(孟德斯鳩著，張雁深譯：《論法的精神》[北京：商務印書館，1961]，第20章，第1節。)也即是把商業和美德簡潔地聯繫了起來。更重要的是，孟德斯鳩認為商業中發明的匯票和套匯的可能性，給貪婪的王權以極大的制約，對克服專制來說，的確，雖然商人的欲望可能會促使他們做壞人，然而其利益卻阻止他們這樣做。在此意義上，資產階級作為美德的主要代表的光輝形象就牢固地確立起來了。相應地，追求利益本身就成為了美德！

雖然思想家們並沒有一味地稱讚商業，比如孟德斯鳩也認為貿易也導致將人的一切關係都金錢化，使人們不再好客和喪失其他美德，而這些美德使人們並非總是刻板地討論自身的利益。但由於他論證的追求利益本身是一種美德合乎新秩序的現實需要，因此他的這些警告顯得蒼白，儘管他是對的，但這一面還是沉入了歷史的深處。當兩大工業階級全面接管新秩序後，其後果就留給個體去細細品嚐，這時人就只得「焦慮是人的常態」的託詞來自我安慰了。新的意識形態的無比強悍之處在於，當人焦慮的時候會發現他找不到發泄的目標，因為它是一張嚴密的「非人」的網，曾幾

何時，它還正是自己孜孜以求的幸福目標！

四 結 論

忘記了先賢的警告，當人們歡欣鼓舞地接受了新秩序之後才發現，不是每個人都能成為商人，成為資產階級的一員。新秩序給人的承諾是每個人都有平等的機會，可惜，機會並不平等地分配給每個人。個體的美德還完全可能導致「合成的謬誤」，更嚴重的是，「商業令人渴望安定和效率。這可能是專制主義的另一根源。」(頁111) 人們本想告別專制政治的危險，這一危險卻益發糾纏在每個人的身上。天堂沒能在塵世中建起來，可正如盧梭 (Jean-Jacques Rousseau) 所說，回去的路卻已經迷失了！

葡萄牙有諺語說：「通往地獄的道路通常是由美好的願望築成的。」這和赫希曼對「利益與欲望」的執著關注異曲同工。恰如森所說，赫希曼試圖要說明的是，「在一個互相依存的世界裏，人們行為的某些結果是非預期的，也許這種現象並非是特別引人注目的。人們的行為往往會產生許多不同的結果，其中只有某些結果可能為人們所關注。」這實際上是現代性承諾的特徵，雖然人們存在多元選擇的可能，但經常也是別無選擇，因為你生活在「現金為王」的時代。知識探討只能提醒人們「預期的結果顯然對人們所採取的行為，即恰恰旨

在實現某些意圖的行為，是十分重要的。因此，那些被預期將要實現的結果卻未實現，這確實是事與願違，因而是更為令人關注的。」(森寫的序言)

當今的政治理論界，對於各種主義與問題的爭辯令人目眩，然而實際上，這只是各種利益群體對商業秩序政治的維護或修補而已，和落入網中的魚兒的掙扎沒甚麼根本

差別。赫希曼深明此理，所以他說：「人們能夠祈求於歷史的，尤其是思想史的，很可能是：不是消除爭議，而是提高爭論的水平。」(頁125) 這絕對是思想史家的睿智之處，也是思想史研究具有極高價值之處，這一深度的細膩決非純理論或哲學研究、也不是經驗研究所能達到的，因而也是不可取代的。

《二十一世紀》網絡版目錄

2005年4月號、5月號

第37期 2005.4.30

- 滿 永 土地改革與建國初鄉村政權的合法化建構
- 李成貴 中國三農問題政治經濟學
- 蕭一湘 走出「三農」誤區 重溫三大差別——鄉村建設縱橫探索
- 葉本乾 抵制與壓制：地方治理中鄉鎮權力的兩面性
- 郝 建 「暴力美學」的形式感營造及其心理機制和社會認識
- 楊四平 北島論
- 王茵薇 試論歐美中國藝術史研究中的一些語言問題
- 孫隆基 公元一千年前後(全文版本)
- 湯敏軒 余英時與中國歷史研究：具體方法的視角
- 何方昱 完整的人格 偉大的事業——《新亞遺鏢》與錢穆的教育理想

第38期 2005.5.31

- 申明民 政治轉變中的中國共產黨
- 任羽中 台灣地區基層民主選舉中的「黑金政治」
- 張玉林 中國教育：不平等的擴張及其動力
- 龔刃韜 大學教授、計件工與學術自由
- 蔡志誠 批評旅途與話語實踐——九十年代之後
- 張洪勝 科耶夫與薩義德的《東方學》
- 熊芳亮 「命定」與「突圍」——《西遊記》所蘊藏的一個思想事件
- 翁麗霞 日語演出白毛女中鮮為人知的故事
- 周承人、李以莊 讚美與求真——覆黎錫先生

圖片來源

封面、封二上、97下 藝林國際有限公司提供。封二文字：金觀濤。

封二中、封三下、封底 活力星國際有限公司提供。

封二下、97上、98、99、100、封三上 香港蒼萃有限公司提供。

頁48、49、108 劉小軍攝。

頁54、65、110、124 資料室圖片。

頁139 小林英夫、福井紳一：《滿鐵調查部事件の真相：新發見史料が語る「知の集團」の果てぬ夢》(東京：小學館，2005)，封面。

頁142 喬健、劉貫文、李天生：《樂戶：田野調查與歷史追蹤》(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2)，封面。

頁146 應星：《大河移民上訪的故事：從「討個說法」到「擺平理順」》(北京：三聯書店，2001)，封面。

頁150 孫江主編：《事件·記憶·敘述》(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4)，封面。

頁154 赫希曼(Albert O. Hirschman)著，李新華、朱進東譯：《欲望與利益——資本主義走向勝利前的政治爭論》(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03)，封面。